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本书编写组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铁燕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2,25印张 265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册

ISBN7-5035-0123-5/A·13

定价：2.80元

撰 稿 (按篇目先后为序)：

高维学	陈 升	冷鹤鸣	孙清彬
张明礼	李国玮	李 友	萨德金
齐 诚	郭 慧	王子彬	卢婉清
杨 松	陈柏灵	杨春贵	杨华生
马清健	陈瑞生	张祥生	吕英寰
章岳云	杜国辉	罗子桂	蔡衍振
奚瑞芬	殳安英		

统 稿

杨春贵 吕英寰 陈瑞生

前　　言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50周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30周年，全国党校系统100多名哲学工作者于1987年6月11日至15日在昆明市召开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的论文和大会发言，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崇高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指导作用，探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一系列重大哲学理论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问题。

本书就是以会议提供的论文为基础，经过加工、修改编辑而成。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历史地位及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二）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及其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三）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及其发展，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和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问题；（四）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及其发展，以及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解决方法等。全书各篇文章之间有一定内在联系，大体上涉及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些基本的哲学理论问题。

参加本书论文初选工作的有：李公天、任登第、董友忱、

吕英寰、黄守权、孙继田、辛志、杨华生等同志

中央党校杨春贵、吕英寰、陈瑞生同志对各篇论文进行了修改、加工、整理，负责全书的编稿工作。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的负责同志和哲学教研室的同志为编选本书也给予了热情关怀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1987年10月15日

目 录

代序：针对新时期的实际，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	(1)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5)
哲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	
本特点.....	(29)
略论毛泽东对中国哲学思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42)
毛泽东方法学思想初探.....	(56)
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68)
对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哲学思考.....	(78)
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	(91)
论指导规律、行动规律和客观规律的统一.....	(104)
论《实践论》的主客体观.....	(116)
试论现代实践的主体性特征.....	(128)
论从认识到实践的中间环节.....	(140)
坚持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51)
怎样实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63)
试论认识的超前性.....	(169)
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	(183)
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200)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实践论》的运用与发展...	(212)
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与创造性工作方法.....	(222)

矛盾学说和系统观点	(234)
学会在实践中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	(257)
《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过程论	(273)
坚持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	(289)
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辩证思想	(30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 恢复和发展	(319)
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	(334)
经济特区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殊表现及其解决方 法	(348)
试论理顺领导和群众的关系	(363)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贯彻“双百”方针	(375)

针对新时期的实际， 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

韩树英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实践论》、《矛盾论》讲演50周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30周年。在纪念这些讲演发表的时候，让我们通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再认识，提高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坚持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自觉性，这对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 哲学思想伟大意义的再认识

毛泽东同志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的讲演已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历史性变化。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曲折发展，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各族人民在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我们正在从事前人没有经历过的光辉而又艰巨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过程中，在全面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发

展过程中，我们不断遇到从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等待着我们作出科学的答案和正确的解决。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改革浪潮中曲折前进。如何通过改革旧体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当今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也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需要我们作出科学的说明和正确的把握，而单纯依靠以往书本上的现成结论，是不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在曲折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面前，有的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当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才有可能对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回答，而不致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不能停滞不前，它必须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新的实际，并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大推向前进。今天，应该结合这种历史任务来进一步思考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作用，通过再认识重新从中汲取智慧。

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工人阶级为了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在运用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还需要具体解决与此有关的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这就是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批判各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哲学倾向。

恩格斯在晚年就曾经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

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恩格斯在这里是说，不借助辩证法，不借助哲学，不解决有关的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运用于实际。列宁在历史的新时期强调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批判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他指出一般原理在不同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应用，提出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等哲学指导原则。为了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解决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不仅应该遵循恩格斯、列宁提出的思想和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这些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和具体化，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的极其特殊的条件，把这一问题尖锐地突出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能取得胜利，同时，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而为了解决这个“结合”问题，为了解决这种运用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必须以进一步解决有关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为前提。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革命实践中，在总结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潮，而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从世界观到工作作风多方面地丰富、具体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它的核心，它的突出贡献，应该说是在特殊地解决把马克思主义普

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从而发展理论的一般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在今天应该强调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和伟大意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的这种普遍性的意义，就在客观上规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应该具有的地位。当前，当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它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克服被实践证明为过了时的陈旧观念，反对思想僵化，大力发展理论时，应该进一步把握和探索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种意义和作用，对它作出足够的估计，对它进行再认识。

作为运用、发展理论的哲学理论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又有许多特点，在今天我们不仅应该重温它的内容，而且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这些特点，以便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下面的一些特点，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构成了解决理论和实践统一问题的相当严整的哲学体系。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理论的任务，这不是简单地凭借某个方面的哲学原理就能做到的。为此，毛泽东同志不仅从认识论和辩证法论述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方面的关系，而且把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结合，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深刻阐发了作为认识和实践的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在理论和实践结合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上述这些方面的关系又相互联结，融为一体。理论和实践、一般和特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辩证的对应关系，就是值得深入把握和研究的。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着眼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发展理论时分别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学说，完善和进一步系统化了这些学说。

《实践论》在全面概括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基础上，分层次地论述了从对具体事物发展的一定过程的认识到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无限发展的完整的认识发展过程。《矛盾论》紧紧把握住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提供了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发展的逻辑体系。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认识问题和矛盾问题没有停留在静态的论述上，而是致力于动态的分析从发展的过程性展开了论述。例如，在《实践论》中，他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重要原则和要求。在《矛盾论》中，他不仅要求把握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发展中的每一过程的矛盾特殊性，并且进而提出了过程发展的阶段性的哲学范畴，要求把握每一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这方面的特点也需要结合当前发展理论的要求，做进一步的探讨。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同对待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各种错误态度的斗争中，在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哲学倾向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又揭示了政治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根源，指明了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不能从哲学上揭示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态度的认识根源，不能在哲学理论上深入地具体地批判和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潮和倾向，不能阐明这些错误倾向在政治上的危害性，就不能引导人们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运用于实际从而发展理论的任务。毛泽东哲学思想包含有这方面的极

其宝贵和丰富的内容，在今天也需要我们继承、发扬和进一步探讨。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反对主观主义、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运用问题时，以解决一系列具体哲学理论问题为基础，集中地鲜明地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者观察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的要求和总的指导原则。在任何时候，只有坚持这种出发点和原则，才能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一堆灰色的僵死的教条，而当作观察问题的活生生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个别结论，而是诉诸发展着的生活与实践，在实践中大胆打破陈旧观念的束缚，勇于探索真理。一句话，只有如此，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实际，坚持并且不断发展理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经过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检验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建国以后，作为哲学思想，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对各方面的工作和实践，继续发挥了普遍的指导作用。1957年毛泽东同志把《实践论》特别是《矛盾论》的思想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分析，发表了许多在今天也应该遵循的重大原则。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但这并不表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是不正确的。从思想上来说，这恰恰表明他离开了这种正确思想的轨道，因而从反面证明在任何条件下按毛泽东哲学思想办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前，我们有必要针对新的实际，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

新时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坚持、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在我国的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可喜的变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这是和我们党重新确立和恢复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我国新时期的实际分不开的。

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以思想理论和观念上的变化作为先导。1978年开展的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此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此前后，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作了一系列深刻、精辟的阐述。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和文章中，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基本点”和“精髓”。这些精辟的阐述和概括，丰富和具体化了毛泽东思想首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使我们党恢复和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应有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我们党通过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否定“文化大

革命”开始，进而上溯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取得了一系列认识上、理论上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1985年4月，邓小平同志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曾经指出：“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末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概括，指出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所解决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最根本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与这个本质特征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和逻辑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实际相结合，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在正确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观念上的突破。以此为依据，在实践中就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确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开始了意义深远的体制改革。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就不会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再认识，也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特别是改革的伟大胜利。

作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总成果，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结晶，体现为我们党作出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论断。这些论断分别表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根本任务，新内容、新贡献和最基本的根据。

第一，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30日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53页）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思想作了反复阐述。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列宁在晚年，曾经提到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有利的条件先夺取政权，然后创造条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俄国和我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可是，我们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而是从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出发，在三大改造以后，继续把生产关系的改变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按照“一大二公三急”的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实行“穷过渡”。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这只能导致贫穷的普遍化。即使有时注意到生产力的发展，也往往采取错误的方法，把主观意志强加于经济生活，单纯用发挥精神力量的方法搞生产，例如“大跃进”。这种做法在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及其基本要素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大革命”中又把阶级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纲”，否认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同时，把发展生产的要求诬蔑为“唯生产力论”，大肆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抛弃和否定了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法，实事求是地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